

# 党史参考资料

(三)

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

一九八一年十月

# 党史参考资料

(三)

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

一九八一年十月

# 目 录

-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建党问题……………肖效钦（1）
-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  
的初步考证……………绍维正（43）
- “七一”的由来……………绍维正（56）
-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问题的探讨……………张 钟（59）
- 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王会悟（68）
- 陈独秀从何时称为党的总书记？ ……韩泰华 牛桂云（70）

#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的 建党问题

肖效钦

党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二〇年到二二年的建党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说是党的组织的最初阶段。这个阶段里头出现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但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党。第二阶段，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召开了“一大”，标志党的建立，但没有解决党的纲领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所以还是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到了第三阶段，解决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问题以后，使党有了明确的战斗方向。

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和它的历史任务以及目前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教师，我就不系统地讲了。只讲一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也只有在共产主义小组产生以后，才能有这个结合，党的产生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的成长和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这两个条件才能够产生党。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我想讲几个。

（一）首先，讲一下上海发起组和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

过去，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完全否定了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的建党作用，突出了湖南建党的作用，把湖南说成是全国建党的中心，这实际上是颠倒了关系。湖南是地区性的，上海具有全国性，湖南还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才开始建党的。为什么首先在上海建党呢？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五四时期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方是上海，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就是上海的工人运动，上海产业工人比较多，觉悟高。这个自然为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二个因素就是《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因素。《新青年》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广，陈独秀的名声也很大，我们现在讲课中，讲马列主义传播是把李大钊放在前面。确实李大钊传播马列主义比较早，但比起社会声望来说，陈独秀是超过李大钊的，了解陈独秀的人多。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到中国以后，他虽然先在北京见到李大钊，但是他还是要找到《新青年》及其主编陈独秀，所以他要到上海。我们说党的产生是有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但是共产国际也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个作用也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包括创建的三个阶段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总的来说，在建党阶段的作用是好的，但到后来问题就多了。

上海发起组，是魏金斯基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上海发起组何时建立？现在有两种说法，有的说是在五月，有的说是在八月，现在看来八月还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比较充分些。上海小组成立有个酝酿的过程，应该说是五月开始酝酿，八月成立。

根据之一，当时有些成员，比如，邵力子，他的回忆当中，讲到上海，五月份开始有了马列主义研究会，以后才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在回忆中，也认为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也讲到了马列主义研究会。施存统也讲有个酝酿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章程”，章程共有六条，这说明上海是有一个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过程。虽然研究会的活动不多，但是规定很具体。另外，根据李达的回忆，李达是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自己说八月份才从日本回来。周佛海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是暑假回来的，他参加了会议。而《新青年》的改组和《劳动界》的产生都是在这个时候。

上海发起组应该怎么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看：

1、上海发起组实际上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上海发起组建立时，不叫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其它地方都有支部，有什么根据呢？有这么几个材料作根据：

a.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二〇年11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材料是很可贵的，是从共产国际档案材料中来的。这是最早一篇《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是说在“一大”前半年，就已经明确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了。这个宣言与

后来“一大”的党纲思想是一致的，在当时看来，水平还是很高的。如果不是成立共产党，怎么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呢？

b.与此同时，在二〇年十一月，陈独秀和李达创办了《共产党》机关刊物，它的名字也叫《共产党》月刊。

c.再从上海发起组成员的回忆来看。李达的回忆说当时在上海不叫共产主义小组，就叫中国共产党。施存统说开始就叫共产党。包惠僧也讲二〇年夏天成立了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邓中夏写的《职工运动史》中，虽然没有讲上海，但是他讲了北京当时成立党支部，不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我们看毛主席和蔡和森的通信当中，也讲到：“党的一层仲甫兄已在进行”。说明当时建立的是党。后来，为了和“一大”加以区别，所以把前面一段叫做共产主义小组。采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最早不是陈潭秋，是而葛萨廖夫，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比陈潭秋要早十年。也是最早的一部党史。他在文中写道：“一九二〇年初，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小组成立后，其他各大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这是最早出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三六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也用了这个名称。同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他写的《英勇奋斗二十五年》中也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此后，我们就通用了这个名称了，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的影印本时候，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改为“上海发起组”。这个发起组，是为了区别其它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起得好，这样，就和其它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

加以区别了。现在，我们讲义、书刊恢复了这个名字。最近，上海“一大”纪念馆写信主张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个提法可以研究。但我个人认为，不如叫发起组好。“早期组织”这个名字，我们整个这一阶段都可以叫“早期组织”，用发起组可以跟各地小组加以区别。不管用什么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起到了临时中央的作用。这是上海发起组的第一个作用。

2、从实际来看，上海发起组与各地建立了联系，帮助各地建党的。据李达的回忆，上海发起组建立后，邀约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武汉的董必武，山东的王尽美，东京的施存统，由他们来建立各地的支部。陈独秀还委托张申府到巴黎建党。陈独秀自己到广东帮助建党。

3、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学说，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党的知识，一九二〇年八月底，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接着在11月又办起了《共产党》月刊，《新青年》还是由陈独秀主编，《共产党》月刊是由李达主编的。毛主席给蔡和森的通信中对《共产党》月刊的评价很高，称它为“旗帜鲜明”四个字。《共产党》月刊主要是宣传党的知识，介绍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和经验等，有力地推动了建党的工作。

4、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纲领草案，为后来“一大”的党纲奠定了基础。1920年11月的《宣言》是作为党员学习文件，并以此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纲领草案在“一大”以前有没有？现在有三个地方可以证明是有的，（当然，现在没有看到文字的东西。）一是，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在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候，曾讨论过这个



草案，而且在讨论当中，还发生了分歧；二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讨论这个草案时，无政府主义者不接受，退出了会议；三是李达回忆中，讲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讨论中，李汉俊反对这个草案，认为陈独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是为了搞个人专制，他主张地方分权。

5、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上海发起组最早解决这个结合，推动各地的结合。在陈独秀领导下，于1920年8月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自觉结合的最早尝试。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怎么结合呢？里面有一个渠道，就是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开始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里面。通过办这个刊物把它灌输到工人中去了，采取通俗的、生动的语言，结合工人本身受压迫的遭遇，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一个建立了工会，20年11月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同年12月又改组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达一千三百多人。给全国作了榜样。

6、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同时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是俞秀松，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个人以前说他叛变了，现在来看还是牺牲的。上海建团，推动了各地建团工作。此外，上海还办了一个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输送革命青年到苏联去学习，为党培养了干部。

上海发起组陈独秀等人为筹建中国共产党作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所以陈独秀在“一大”被选为书记，是很自然的。当时，陈独秀是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在“毛选”注释中说（《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

题》的注解)：由于党的年幼，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的说法，现在应该否定。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否定了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现在，我们应该肯定他在建党中的作用，不能因为陈独秀后期成为机会主义者就否定他的历史作用，否则有些问题就说不清楚了，如为什么我们党成熟了以后，(解放以后)还选了林彪这样的骗子当接班人，还写进党章，是不是以此说我们党还没有成熟呢？还处在年幼呢？所以不能这么说，应该有唯物主义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要有前期和后期的区别，前期应该肯定他的主流，不能因为后期他成为了机会主义者而否定他前期的成绩。

## (二) 谈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

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应该说除了上海发起组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建党过程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也最早成立，它是二〇年三月份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现在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九月，一说是十月。现在看来，应该是在十月成立的。我看到一份材料，是北京小组二一年写的报告，内中说“去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诞生”。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是很大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是北京小组派成员去帮助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以及在长辛店工人运动中，都有突出的贡献。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毛泽东同志的早期建党活动问题，这里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湖南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到目前还

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现在出版的一些书，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今年革博展出时，也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后来问他们，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两派意见，一派赞成展出，一派是不赞成展出，最后是不展出。我也到湖南作了调查，湖南也有两派意见，一派说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主要是湖南师院一些同志的意见，一派说虽然文字材料还不足，但是根据各种情况来看，还不能否定，所以清水塘纪念馆还是展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湖南历史研究所也认为不能否认。

下面说一下不同意见的根据。说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的，有这样几个根据：

1、易礼容的回忆。这个人还在，我们也去访问过他，他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要算初步共产主义者，但后来脱离了党。他的回忆现在看来很起作用，他说：“如果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我是应该参加的。可是，毛主席在一大以后才明确跟我说，你是党员”。几次访问他，都是这个意见。他是比较坚决不同意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的。现在，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有些同志也是主张易礼容的看法。

2、根据李达的回忆。他有几次回忆肯定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而且说是九月份成立的，成员有十几个，（这些材料也许同志们都看过）但是其中有一次，就是审查湖南纪念馆提意见的时候，有一个座谈会，他又讲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只有青年团，到了党成立以后，（一大以后）才由团转党的。这个说法就和易礼容吻合的。所以在理论务虚会上，有同志放了一炮，说毛主席参加一大还不是党员，是团员。这个意见的材料就是根据李达的回忆，当时许多同志不

同意这样说。

3、根据长沙新民学会成员的回忆，包括肖三的回忆。周士钊回忆中，都没有提到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我看主要是根据这三个方面。

还有人提出来，湖南若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毛主席跟斯诺的谈话中为什么没有讲？这也可以证明没有。

说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的，也有几个方面的根据：

1、根据一大成员的回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焘等都讲到，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

2、前一段我们到的一个材料。毛主席在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讲了他自己的历史，谈到“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这说明，毛主席肯定了湖南有共产主义小组。

3、二一年五月，毛主席第二次到北京在上海和陈独秀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到湖南以后，和陈独秀还保持着联系。从毛主席与蔡和森通讯中，说明知道上海建党情况的。上海也向湖南寄《共产党》月刊。再从“一大”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当时有六个小组。国内就只有六个小组嘛。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东和山东。那么，这六个小组里面应该包括有湖南。如果说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那么，为什么其他地方，象四川、杭州也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一大没有邀请呢？为什么一大就选了这么六个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要轻易否定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进一步研究。有的同志主张按照李维汉同志的说法，“湖南的新民学会核心实际上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的作

用。”这是第一个问题，湖南到底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我认为还可以维持原来教材上的说法。

第二个问题，对毛主席的初期建党思想怎么评价，这个问题应该说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外地来的同志也经常提到这个问题。现在，有的讲义是作为一节来写的，我对这个问题有看法，我认为这个写法实际上是过去拔高的继续，因为过去讲毛泽东同志初期建党思想似乎要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原则、建党思想来建立的，这个说法是牵强附会的。五十年代早期的党史讲义和一些册子，都没有讲这一节。从五九年开始，北京几个大学协作组编写中共党史的时候，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说：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在古田会议才出现太晚了。应该早期就有。正好五八年找到了新民学会通信集，在毛主席和蔡和森的通信中讲了这个问题，这就找到了根据，所以，在早期就写进了建党思想。这是最早在讲义中提到的，当然这时候有人写过文章。但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讲到毛主席的建党思想符合列宁建党思想。后来越来越高，干脆党的建设是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产生的。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加以澄清：一个问题是从时间上看，二〇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到中国，就已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要按照第三国际的榜样（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建立党，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而《共产党》月刊《新青年》也都反映出了要建立一个革命党的思想，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都有明确的说明。毛主席和蔡和森的通信中讲到的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这个时间是在二〇年八月以后，一直讨论到二一年初。所以从时间上看上海是先解决了这个

问题，而湖南是后来才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内部讨论，在全国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从内容上来看，新民学会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走革命道路还是走改良道路的问题。至于书中归纳的毛主席提出的建党的几个基本原则，那主要是蔡和森讲的，不能把蔡和森讲的思想变成是毛主席的思想。那个时候中国的建党包括上海实际上是照抄外国的，可以从《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上找到答案。而不是什么按毛主席的思想建党的，事实上这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形成一套建党的理论。所以不要夸大。但是，这样是不是说新民学会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呢？不是的，它的意义表现在：这个讨论使新民学会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新民学会的性质起了变化，对新民学会来讲是一次革命。这次讨论内部发生了分化，不愿意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后来就退出去了，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就入了党和团。这是一个作用；再一个作用，就是对于毛泽东同志本人是有很大作用的，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个讨论促进了毛泽东同志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主席自己讲的是二〇年夏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二〇年夏天，到底以什么为标志呢？找来找去，反复研究认为：就只有这个讨论作为标志，主张暴力革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其他标志还没有。在这以前例为《民众大联合》中，还是主张不流血革命，倾向克鲁鲍特金的思想。（现在有的同志对《民众大联合》一文，评价比较低，认为还是停留在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个大家可以研究，我认为《民众大联合》从当时历史来看，思想境界还是比较高的。

它认识了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潮流，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的作用。但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个可以作为他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作)。所以这个讨论，对毛主席的转变起了促进的作用。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同志是什么时候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现在仍有争论，一种说法：是主席自己讲的二〇年夏天；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毛主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二〇年底或二一年初。这两种意见分歧就在于对湖南自治运动的评价问题，坚持说二〇年底或二一年初转变的人认为：在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同志还是民主主义思想，可从自治运动中写的一篇文章中来看。（毛主席早期搞了二个运动，一个是驱张，一个就是自治运动。自治运动就是第二次到北京回湖南后搞的）。不同意这个意见的认为：①搞自治运动只是个策略问题。这里头也可以找到根据。二〇年毛主席写给易礼容的信里头，明确讲到这个事情：搞湖南的自治运动，只是争取一个好的环境，“都只是为了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新民学会通讯集”第二集）②另外，从自治运动文章看，是存在有民主主义思想，但由于社会的原因，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留有尾巴，并不是彻底解决了的。包括李大钊同志，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些民主主义思想，毛主席也不例外。③不能只看这一段的自治运动，还要看这一段毛泽东同志从事的建党活动。所以说，二〇年夏转变还是可以的，毛主席对自己应该说是最了解。我是这个看法的，当然那个看法也可以研究。

关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湖北共产主义小组谁是发起人，通过什么渠道建立的。董老几次回忆都说是李汉俊交给他的任务，要在武汉建党。而包惠僧的回忆说是刘伯垂到上海时，陈独秀交给刘的任务，到武汉建党，包惠僧多次回忆都是这么说的。（刘伯垂是二七年后脱党。四一年死了）而奇怪的是董老回忆时，讲到五个成员，根本就没有刘伯垂，而包惠僧回忆根本没有讲李汉俊交给董老任务。所以，这就成了两条线索。过去有个习惯，总是根据活人的地位来排历史。董老一直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相信董老而不应该相信包惠僧。这样有时候就有片面性，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看历史。那么，这两条线怎么统一呢？在五四时期，在武汉宣传了反帝反封建，主要是恽代英和陈潭秋，当时恽代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热衷于搞“新村主义”，所以恽代英没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在党成立以后才入党的。董老五四时期不在武汉，他和张国思在上海。董、张是黄安有名秀才，关系很好，二人都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董老和张国思在上海的时候跟李汉俊是邻居，这样就受了李汉俊的影响。一九二八年董老的回忆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另外，董老在给他的秘书张海燕讲过，李汉俊是他的启蒙老师。所以五四以后，1919年8月，董老和张国思回到武汉，创办了武汉中学，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汉俊写信给董老和张国思，要他们在武汉建党。但是董老除了有些宣传活动外，在组织上的建党活动是没有开展的（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后来就有刘伯垂来建党问题。刘伯垂当过律师，是同盟会的会员，和孙中山有过接触，他从日本回来，应孙中山的聘请，在广东高



要县当审判长，但由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是个空架子，没有钱，工资发不下来，所以刘伯垂就辞职不干了。这样就从广东到了上海，然后再回武汉。他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发展了他入党，而且交给他任务，到武汉建党。刘伯垂回武汉后，分别找了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思、包惠僧、郑凯卿，当时，共产主义小组中，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只郑凯卿是文化大学的工友。文化大学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前身。这样六个人于二〇年秋天在董老、张国思的寓所开了第一次会。据包惠僧回忆，讨论了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党纲，也争论了共产党人能否到资产阶级政府作官的问题，张国思赞成做官，陈潭秋反对，后来武汉小组又增加了赵子建、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4个人，共有10个人。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就争取“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恽代英办的，（这里附带说一下：有的人写文章好象“利群书社”一开始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它是搞“新村主义”。在五四时期有一种思潮，主张搞空想主义新村。当时，恽代英就是剃了光头，受“新村主义”的影响很大。）包惠僧去做恽代英的工作（包和恽是亲戚）没有效果。“利群书社”最早参加党的是李伯刚，这个人文革前是武汉市委统战部长，再一个就是林育南，林育南也是“利群书社”的。他们两个都是二一年下半年入党的，还算最早的。他们入党以后，影响到“利群书社”。恽代英的转变是二一年夏天。成立“共存社”，政治上比较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一大”后“利群书社”、“共存社”成员先后入党。所以，对“利群书社”应该作历史的评价，这是关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